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刘盛和, 陈 田, 蔡建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根据 2000 年中国第 5 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 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 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 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 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快于非农化进程, 导致城市化滞后的省区逐渐减少, 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 另一方面, 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地区, 城市化的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 但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 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 城市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 但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关 键 词: 统计数据; 普查数据; 非农化; 城市化; 区域差异; 中国

中图分类号: F129.9; F292

1 引言

随着中国“十五(2001~2005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城市化列为 5 大发展战略之一,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随即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热点与重点^[1-5]。理论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 并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瓶颈”^[6-10], 从而, 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11]。不过, 也有研究表明, 从国际比较看, 不论与一般模式(钱纳里模式)相比、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相比, 还是与亚洲国家相比, 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12,13]。此外, 亦有个别文献认为, 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 而是隐性超城市化^[14]。这些观点上的分歧, 大都源于其所采用的比较指标甚至数据口径的不同。对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衡量, 在经历较长时间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之后^[15-17], 目前基本趋于一致, 大多采用中国人口普查口径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于工业化水平的衡量, 则存在用工业或非农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产值比重)和工业或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所占比重(从业人口比重)等 4 种不同的指标, 数据来源主要为统计数据。除对参照比较模式(钱纳里模式或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不同理解外, “严重滞后论”与“非(严重)滞后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采用产值比重指标而后者采用从业人口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实际上, 有研究表明, 由于中国工业化的偏差, 只有用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 才适宜于与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12,13]。作者采用这一衡量指标, 并直接称之为非农化水平。“隐性超城市化”论则对城市人口的数据口径提出了挑战, 认为应当将在乡镇企业就业和外出 6 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都视为隐性城市人口。显然, 该观点

收稿日期: 2003-06-07; 修订日期: 2003-09-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101010); 中国科学院知识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KZCX2-SW-318) [Foundation I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0101010;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ject of CAS, No. KZCX2-SW-318]

作者简介: 刘盛和(1967-), 男, 湖南衡阳人, 博士, 副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主要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 已发表论文 20 余篇。E-mail: liush@igsnrr.ac.cn

混淆了就业非农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忽略了中国大多数乡镇企业散布在农村和许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将抚养人口安置在农村的现实。

纵观现有对中国非农化或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统计数据,并且停留在国家尺度上,极少有研究采用中国历次人口普查通过全样本或抽样调查所获得的非农化水平数据,更少有人对统计与普查口径这两种数据源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进行过比较校验,也缺乏对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的深入分析。实际上,地域广、差异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城市化和非农化本身均具有极为显著的地域差异^[1,8-21],在同一时期,既存在城市化滞后的地区,也存在城市化相对超前的地区,从而具体地分析不同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对指导该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更为重要。作者首先根据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其次,利用第3、4、5次人口普查的人口与从业数据,剖析不同时期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趋势,为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政策提供依据。

2 普查数据与统计数据的比较

当对同一现象或问题存在不同的观察值或数据源时,研究者必须对其准确性进行比较甄别。中国非农化水平的测算,也存在着两种不同来源的数据系列:其一是通过各地各级统计部门对辖区内分行业从业人口汇总而获得的统计数据,发布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的统计年鉴中;其二是在人口普查时也对从业人口的分行业构成进行了全样本(第3、4次人口普查时为100%)或抽样(第5次人口普查时为10%抽样)调查而获得的普查数据,发布在人口普查资料中。问题在于,根据这两种不同数据源而计算出来的全国及各地区的非农化水平的差异极为悬殊,据此分别与同期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譬如,根据统计数据而计算出来的全国非农化水平,在1990年时为39.8%,在2000年时为50%,分别高出同期的城市化水平26.2%和36.1%约13和14个百分点,成为“城市化严重滞后”论的重要论据之一(另一个为中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与中国人均收入或GNP相近的其他国家);但是,如果依据第4、5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则中国非农化水平在1990年和2000年时分别为27.8%和35.6%,显然与同期的城市化大致相当。因而,对计算非农化水平的不同数据源,即统计和普查口径的从业人口总数和非农产业从业人口,进行比较和甄别以确定其各自的准确性与可信度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作者主要通过比较分析2000年全国及各地区的总人口、从业人口及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等指标的统计口径与五普口径之间的偏差及其相互间关系(表1),来推测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并确定其准确性与可信度。

首先,在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各指标的值等于各省区之和;但在统计数据中,全国不等于所有省区之和,极易引起对统计数据可信度的置疑。2000年全国从业人口总数和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分别比所有31个省区的同一指标之和多了8 171万人和5 951万人。

第二,各地区从业人口总数的统计口径与第5次人口普查口径之间的偏差,与其总人口的口径偏差呈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湖北、广东、海南、云南、陕西、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21个省区,户籍统计的总人口数小于第5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数,属于人口净迁入地区,他们的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也小于其普查数据;在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7个人口稠密但经济欠发达的省区,户籍统计的总人口数大

表 1 2000 年中国各地区统计与普查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偏差 (单位: 10⁴ 人)

Tab. 1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level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5th census data in variou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in 2000 (unit: 10⁴ persons)

地区	总人口		从业人口总数		非农产业从业人口	
	偏差量	偏差率(%)	偏差量	偏差率(%)	偏差量	偏差率(%)
全国	-2586.0	-2.0	4275.1	6.4	11751.8	49.3
各省区小计	-3569.0	-2.8	-3896.1	-5.8	5800.9	24.3
北京	-268.0	-19.4	-66.2	-9.6	-49.2	-8.2
天津	-82.0	-8.2	-54.4	-11.8	4.5	1.4
河北	-73.0	-1.1	-352.6	-9.3	656.9	59.4
山西	-101.0	-3.1	-189.0	-11.8	102.9	15.7
内蒙古	-75.0	-3.2	-231.4	-18.5	-13.5	-2.8
辽宁	-103.0	-2.4	-366.3	-16.8	79.5	7.6
吉林	-101.0	-3.7	-235.8	-17.9	34.5	6.9
黑龙江	9.0	0.2	-58.7	-3.5	112.5	15.8
上海	-352.0	-21.0	-138.4	-17.1	-132.8	-18.5
江苏	-369.0	-5.0	-656.4	-15.6	44.8	2.2
浙江	-176.0	-3.8	96.6	3.7	-46.7	-2.7
安徽	292.0	4.9	130.5	4.0	544.6	67.2
福建	-166.0	-4.8	-16.6	-1.0	7.2	0.8
江西	24.0	0.6	91.4	5.0	347.4	59.5
山东	-104.0	-1.1	-763.6	-14.1	495.0	29.2
河南	271.0	2.9	254.0	4.8	943.8	89.1
湖北	-92.0	-1.5	-337.1	-11.8	346.8	36.3
湖南	75.0	1.2	192.9	5.9	539.1	65.9
广东	-2126.5	-24.6	-583.0	-13.1	-511.2	-18.4
广西	235.0	5.2	146.4	6.1	423.7	79.6
海南	-26.1	-3.3	-36.9	-10.0	11.1	9.4
重庆	1.1	0.0	48.6	3.1	279.0	64.5
四川	48.5	0.6	-130.0	-2.8	769.9	75.3
贵州	152.0	4.3	148.9	7.8	323.4	93.8
云南	-211.0	-4.9	-171.8	-7.0	89.5	17.6
西藏	-11.0	-4.2	-10.9	-8.1	5.3	19.6
陕西	-33.0	-0.9	-35.6	-1.9	267.1	49.9
甘肃	-28.0	-1.1	-219.7	-15.7	188.5	65.6
青海	-38.0	-7.3	-21.5	-8.3	21.7	30.4
宁夏	-8.0	-1.4	-19.8	-6.7	9.7	9.2
新疆	-133.0	-6.9	-309.7	-31.5	-94.1	-24.9

数据来源：1.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年。2.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

于第 5 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数，属于人口净迁出地区，其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也大于普查数据；只有黑龙江、四川和浙江等 3 个省区是例外。这说明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也主要是基于户籍来估算汇总的，没有或者没有充分反映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情况，从而导致在省际人口或劳动力净迁入的省区，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没有将这部分从省外迁入的劳动力计算进去，出现低估的偏差；在省际人口或劳动力净迁出的省区，那部分已经迁移到其它省区的劳动力仍被统计为该省的从业人口，出现高估的偏差。而各地区普查口径的从业人口数据基本上是准确可信的。

第三，全国及各地区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统计口径与第 5 次人口普查口径之间的偏差，不仅数量悬殊，而且与其人口总数的口径偏差呈比较复杂的关系。全国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超出普查数据 1.2×10^6 人，偏差率高达 49.3%；在贵州省该指标的两种口径间偏差率更是高达 93.8%。一方面，在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四川、黑龙江等 9 个总人口的统计口径大于第 5 次人口普查口径的省际人口净迁出地区，以及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内蒙古、新疆等 6 个总人口的统计口径小于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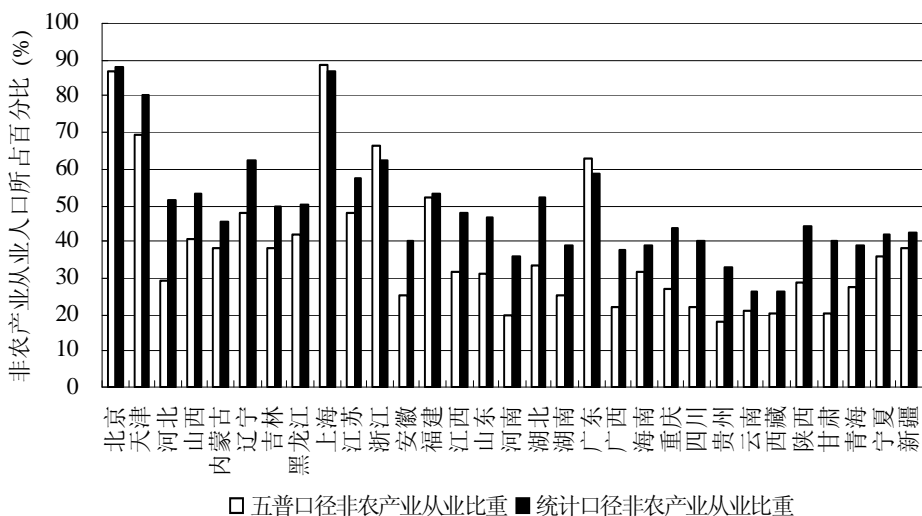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中国各省区五普口径与统计口径非农化水平的比较 (数据来源: 同表 1)

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level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5th census data in variou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in 2000

普口径的省际人口净迁入地区, 其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与普查数据之间的偏差方向与总人口和从业人口的口径偏差方向是一致的, 但其偏差值大多远大于后两者。另一方面, 在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湖北、海南、云南、陕西、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 16 个总人口和从业人口的统计口径均小于第 5 次人口普查口径的省际人口净迁入地区, 其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却是大于、而不是小于普查数据。这说明: (1) 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统计数据也如户籍人口和从业人口总数的统计数据一样, 也主要是基于户籍估算汇总的, 从而存在着对省际净迁出地区的高估和对净迁入地区的低估问题; (2) 非农产业从业人口的普查数据也存在较严重的低估现象。因为中国农村目前仍大量存在的“亦工亦农人口”和迁入城镇尚不足 6 个月的农村劳动力, 甚至包括部分进城务工经商 6 个月以上的农民, 在填写人口普查表格时, 会由于自己仍是农业户口并在农村保留着联产承包的土地, 而填报并被归类为农业从业人口, 虽然他们实际上已部分或全部从事非农产业工作。

第四, 除广东、浙江、上海的普查口径非农化水平略高于统计口径非农化水平之外, 其他 28 个省区的统计口径非农化水平都大于其普查口径非农化水平。他们之间的偏差北京和福建相对较少, 但在其他省区一般为 30%~40%, 最多高达 80%~90% (图 1)。

综上所述, 根据统计数据和普查数据所计算的非农化水平均不甚准确。不过, 在比较分析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时, 宜采用普查数据来计算各地区的非农化水平, 而不宜采用统计数据。因为在普查数据中, 各地区的从业人口 (分母) 是准确、可比的, 并且对非农产业从业人口 (分子) 的估计偏差也比较容易把握, 总体上是对东部乡镇企业较发达地区的低估程度较重, 而对中西省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少。统计数据对各地区从业人口总数和非农产业从业人口都存在着低估或高估的影响, 较难估算其比值即非农化水平的偏差方向与程度。

3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3.1 类型划分

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 (滞后、超前、还是

比较协调),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其一, 可以比较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在某两个观察时点之间的变化速度: 如果两者的变化速度相等时, 则人口的产业转换与空间转移是同时完成的或同步的^[22]; 如果前者的增长速度快于后者, 则说明有一部分人口虽然已经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 但仍滞留在农村, 表现为“城市化滞后”; 如果前者的变化速度小于后者的增长速度, 则说明有一部分人口虽然已经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 但是并没有在非农产业中就业, 造成“城市化超前”。需要指出的是, 部分研究^[23]所采用的“城市

化偏离系数 ($U_e = \frac{\Delta P_u}{\Delta P_{na}}$, 其中, U_e 城市化偏离系数, ΔP_u 为观察期内城市人口比重变化, ΔP_{na} 为观察期内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变化。) ”的表述不甚准确。因为当城市化水平增加而非农化比重下降时 (如乡村工业破产、职工回村从事农业), 城市化偏离系数小于零为城市化滞后, 这显然与实际情形相悖。其二, 是比较其在同一观察时点的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大小。其判断的结论事关各地区城市化政策的选择, 是必须和重要的, 但显然这种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缺陷和风险。因为农村人口也需要一定比例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口为其提供生活、生产等方面的服务, 城市人口统计中一般也包含一定比例的农业从业人口, 而这种比例的大小、以及城市与乡村和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带眷系数的差异等, 都会影响其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偏差。一般地, 非农化水平在一定幅度内高于同一时期的城市化水平, 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因为城市人口中农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一般小于农村人口中非农从业人口的比重。如根据钱氏模式, 在人均 GNP 为 1 000 美元 (1997 年价) 时,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 44.3%, 城市化水平为 36.2%, 前者约大于后者 8 个百分点。

参照世界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 并考虑到中国普查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低估偏差, 根据中国各地区在同一观察时点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偏差 (现状水平偏差) 或者它们在不同观察时点间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之间的偏差 (增长幅度偏差), 可以将中国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划分为以下 5 种类型, 以便清晰地提示中国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及其发展趋势: (1) 城市化严重滞后型: 在同一观察时点非农化水平大于城市化水平 10% 以上; 或者在不同观察时点间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大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 10% 以上。(2) 城市化滞后型: 在同一观察时点非农化水平大于城市化水平 5%~10%; 或者在不同观察时点间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大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 5%~10%。(3) 基本协调型: 在同一观察时点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偏差在 5% 以内; 或者在不同观察时点间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之间的偏差在 5% 以内。(4) 非农化滞后型: 在同一观察时点非农化水平小于城市化水平 5%~10%; 或者在不同观察时点间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小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 5%~10%。(5) 非农化严重滞后型: 在同一观察时点非农化水平小于城市化水平 10% 以上; 或在不同观察时点间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小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 10% 以上。

3.2 不同时间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省际差异

在 1982 年中国 29 个省区中 (图 2a), 非农化水平大于城市化水平的有 27 个, 小于城市化水平的只有 2 个。其中, 江苏 (偏差为 18%, 下同)、上海 (15.5%) 和浙江 (11.9%) 3 省属于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型, 福建 (9.1%)、黑龙江 (8.9%)、广东 (8.7%)、河北 (8.7%)、青海 (8.7%)、北京 (6.8%)、湖北 (6.4%)、江西 (6.1%)、西藏 (6.1%) 和湖南 (5.8%) 等 10 个省区属于城市化水平滞后型; 而属于非农化水平严重滞后型的省区则没有, 非农化滞后型的省区也只有贵州 (-5.4%)。

在 1990 年中国 30 个省区中 (图 2b), 非农化水平大于城市化水平的有 21 个, 其它 9 个省区的非农化水平小于城市化水平。其中, 上海 (21.5%)、江苏 (14.1%) 和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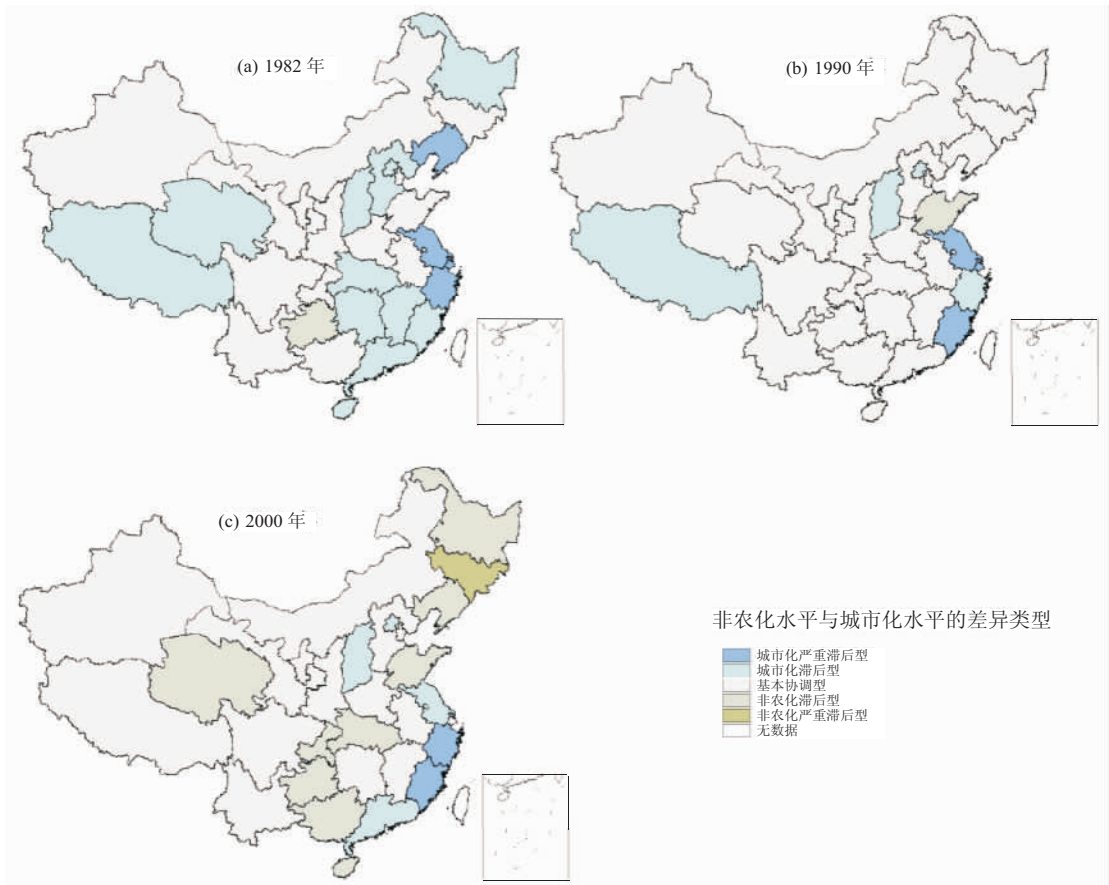


图 2 1982、1990 和 2000 年中国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省际差异

Fig. 2 Provincial dispar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levels and the urbanization levels in China in 1982, 1990 and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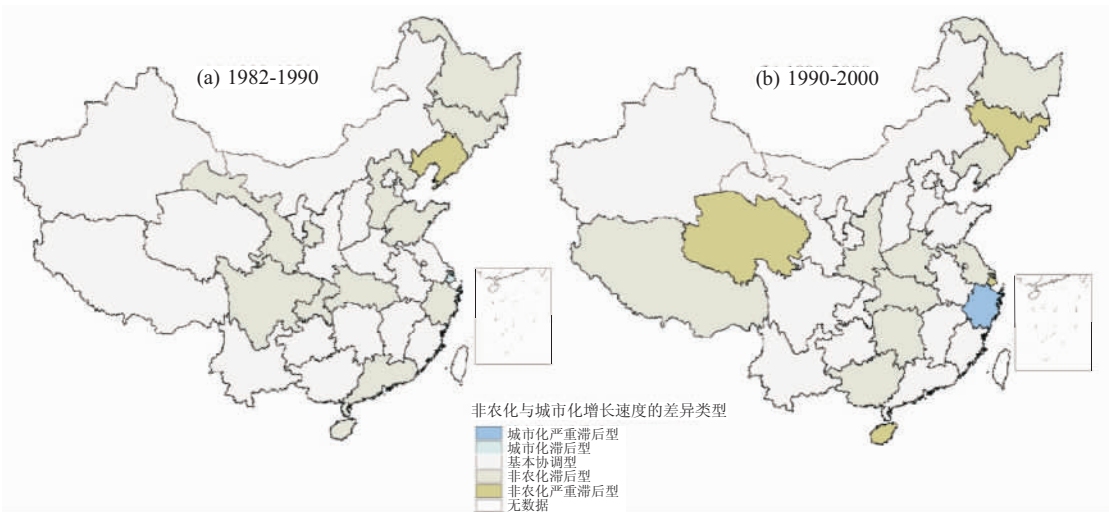


图 3 1982~2000 年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增长速度的省际差异

Fig. 3 The provincial disparit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wth rates 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 levels and urbanization levels in China in 1982-2000

(10.8%) 3 省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西藏 (7.7%)、北京 (7.6%)、山西 (6.1%)和浙江 (5.9%) 等 4 个省区属于城市化水平滞后型；而属于非农化水平滞后型的省区只有山东省 (-6.2%)，非农化水平严重滞后的省区则没有。

在 2000 年中国 31 个省区中 (图 2c)，非农化水平大于城市化水平的有 12 个，其它 19 个省区的非农化水平均小于城市化水平。其中，浙江 (17.6%) 和福建 (10.6%) 2 省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北京 (9.4%)、广东 (7.6%)、江苏 (6.2%)和山西 (5.7%) 等 4 个省区属于城市化水平滞后型；而吉林 (-11.4%) 属于非农化水平严重滞后型，属于非农化水平滞后型的省区有黑龙江 (-9.4%)、海南 (-8.2%)、青海(-7.2%)、山东 (-6.8%)、湖北 (-6.1%)、辽宁 (-6.1%)、重庆 (-5.9%)、广西 (-5.8) 和贵州 (-5.7%) 等 9 个省区。

3.3 非农化与城市化增长幅度的省际差异

在 1982~1990 年期间 (图 3a)，全国 29 个省区中只有 8 个省区的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大于其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其中，增长幅度之差大于 5% 及以上的省区只有上海 (5.97%，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与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之差，下同)，属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的城市化水平在这 8 年期略有下降。其它 21 个省区的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则小于其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其中，辽宁(-11.9%) 属于非农化发展严重滞后型，黑龙江 (-9.1%)、湖北 (-7.7%)、山东 (-7.0%)、甘肃 (-6.0%)、广东 (-6.0%)、浙江 (-6.0%)、四川 (-5.5%)、吉林 (-5.5%)、河北 (-5.2%) 和青海 (-5.0%) 等 10 个省区属于非农化发展滞后型。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这 8 年期间，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和湖南等 5 省的非农化水平不升反降，尤以江西减少的幅度最大，为 -3.6%。

在 1990~2000 年期间 (图 3b)，全国 30 个省区中只有 6 个省区的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大于其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其中浙江省的超出幅度高达 11.7%，属于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型；但是属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的省区则没有。其它 24 个省区的非农化水平增长幅度则小于其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其中，非农化发展严重滞后型的省区增加到 4 个，分别为上海 (-21.3%)，青海 (-10.9%)、吉林 (-10.9%) 和海南 (-10.1%)；属于非农化发展滞后型的省区则有黑龙江 (-9.1%)、江苏 (-7.9%)、广西 (-7.3%)、湖南 (-6.5%)、西藏 (-6.5%)、陕西 (-6.0%)、辽宁 (-5.9%)、湖北 (-5.3%) 和河南 (-5.3%) 等 9 个省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 3 省的非农化水平继续前一时期的下降趋势，江西和湖南省的非农化水平已转降为升，但天津和甘肃加入了非农化水平下降的行业。

3.4 基本特点

(1) 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无论从现状水平还是从变化幅度来看，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因而，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在同一观察时点，既有城市化水平滞后或严重滞后型的省区，也有非农化水平相对滞后或严重滞后的省区，不过，更多的省区属于城市化水平基本协调型。在不同观察时期间，也存在城市化滞后或严重滞后、非农化滞后或严重滞后及基本协调等多种类型。

(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非农化进程，从而城市化滞后的省区在逐渐减少，而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在 1982~1990 年和 1990~2000 年 2 个变化期间，分别只有 2 个和 6 个省区的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小于其非农化水平的变化，其它均是前者快于后者。在 1982~1990 年期间，辽宁属于非农化发展严重滞后型，广东、浙江、山东等 10 个省区属于非农化发展滞后型。在 1990~2000 年期间，属于非农化发展严重滞后型的省区增加到了 4 个，滞后型的省区仍然有 9 个。因而，自 1982 年到 2000 年，属于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型的省区由 3 个减少至 2 个、属于城市化滞后型的省区由 10 个减少到 4 个，而属于非农化水平滞后型的省区由 1 个急增至 9 个，严重滞后型的省区也从无到有。

(3) 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增长速度快的省区,大多属于城市化滞后型,而黑龙江、辽宁、吉林、青海、贵州、广西、湖北、重庆、海南、山东等城市化比较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省区,却大多属于非农化滞后型或城市化超前型。这主要是因为前一类省区的非农化发展更快、水平更高;而后一类省区的非农化进程更为缓慢。

(4) 中国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之间的偏差,关键在于非农产业就业发展缓慢,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于缓慢,比重较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辽宁、吉林等东北 3 省在 1982~1990 年和 1990~2000 年期间的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一直在绝对下降,呈现出负增长;湖南和江西在前一变化时期,天津和甘肃在后一变化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实际上,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水平增长幅度并不大,但由于非农化水平的绝对减少,导致出现相对的非农化发展滞后或严重滞后。这说明,在相应时期内,这些省区的非农产业就业增长非常缓慢,甚至低于全社会从业人口总数的增长,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更加严重。

4 结果与讨论

(1) 统计口径和普查口径的非农化水平均存在偏差。不过,在比较分析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时,宜采用普查数据来计算各地区的非农化水平,而不宜采用统计数据。因为各地区统计口径的从业人口和非农产业从业人口数据主要是基于户籍汇总计算的,没有充分考虑人口及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因而都存在着对净迁出地区的高估和对净迁入地区的低估问题,较难把握其对非农化水平估算的偏差方向与程度。而各地区普查口径的从业人口数据基本上是准确可信的,虽然对非农产业从业人口数的测算普遍存在过低估计的偏差。

(2) 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因而,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3) 中国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在近 20 年期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 1982 年时,中国各省区普遍存在城市化滞后问题。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快于非农化进程,从而城市化滞后的省区在逐渐减少,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至 2000 年时,城市化滞后的省区已大幅减少,而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急剧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许多中西部省区的非农产业发展极为缓慢所致。

(4)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发展速度快的地区,目前的城市化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而在大部分城市化比较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其城市化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Wang Yang.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eijing: Planning Press, 2001. [汪洋. “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研究. 北京: 计划出版社, 2001.]
- [2] Yang Weimin. China's Urbanization Strategy: Priorities and Policies. In: Workshop on China's Urbanization Strategy: Opportunities, 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 Beijing, 2000.
- [3] Yang Xiuzhu. Basic guidelines 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0, 24(1): 20-25. [杨秀珠. 浙江省城市化工作的基本思路. 城市规划, 2000, 24(1): 20-25.]
- [4] Jiang Changyu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1999, (2): 20-21. [姜长云. 试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经济管理与研究, 1999, (2): 20-21.]

- [5] The Project Group. Report on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2002. Beijing: Xiyuan Press, 2003. [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编写组. 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 2002.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3.]
- [6] Zhao Xinping, Zhou Yixing. Review on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2, (2): 132-138. [赵新平, 周一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132-138.]
- [7] Hu Xuwei. Some considerations on urbanization and the planning of urban system.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0, 24(1): 35-40. [胡序威. 有关城市化与城镇体系规划的若干思考. *城市规划*, 2000, 24(1): 35-40.]
- [8] Hu Anga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Study on China's Population Economy.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ress, 1989. [胡鞍钢. 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 [9] Li Wen.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backwardness of urba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1, (4): 64-75. [李文. 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4): 64-75.]
- [10] Wu Zili. Why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id not result i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2001, (1): 64-68. [吴子力.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为何不导致城市化. *南京社会科学*, 2001, (1): 64-68.]
- [11] Fan Gang. Urbanization: a central issu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xt period. <http://www.curb.com.cn>, 2001. [樊纲. 城市化: 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 <http://www.curb.com.cn>, 2001.]
- [12] The Project Group. Economic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44-55. [“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 44-55.]
- [13] Shi Yulong. Some Problem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the Tenth Five-Year Period. <http://www.curb.com.cn>, 2001. [史育龙. 关于十五时期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http://www.curb.com.cn>, 2001.]
- [14] Deng Yupeng. Invisible over-urbanization and its causes. *China Economic Times*, 2002-09-29. [邓宇鹏. 隐性超城市化及其成因. *中国经济时报*, 2002 年 9 月 29 日.]
- [15] L J C Ma, C Cui. Administrative changes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7, 77(3): 373-395.
- [16] J Shen. Modelling urban-rural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6, 28: 1417-1444.
- [17] Xu Xueqiang, Zhou Yixing et al. Urban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97. 16-28. [许学强, 周一星等. 城市地理.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16-28.]
- [18] Liang Leiwen.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 *Population Sciences in China*, 2001, (1): 45-51. [蒋末文. 中国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原因探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01, (1): 45-51.]
- [19] Chen Li. The strategic distribution of the designated cities and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Journal*, 2002, (2): 22-27. [陈磊. 设市的战略布局与我国城市化的地区差异. *人口学刊*, 2002, (2): 22-27.]
- [20] Xu Xueqiang, Yeh Gar-on. Provinci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6, 41(1): 8-22. [许学强, 叶嘉安. 我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 *地理学报*, 1986, 41(1): 8-22.]
- [21] Ning Yuem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ynamics and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since 1990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8, 53(5): 470-477. [宁越敏. 新城市化进程——90 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 *地理学报*, 1998, 53(5): 470-477.]
- [22] Meng Xiaochen. On th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2, 47(5): 441-450. [孟晓晨. 城乡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地理学报*, 1992, 47(5): 441-450.]
- [23] Wang Yiming, Yang Yiyong. Some problems on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Wang Yang (ed.),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eijing: Planning Press, 2001. 80-99. [王一鸣, 杨一勇. 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见: 汪洋 主编. “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研究. 北京: 计划出版社, 2001. 80-99.]

Provincial Disparit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IU Shenghe, CHEN Tian, CAI Jianm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5th census data and the China's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respectively calculated from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al data are firstly compared and checked. While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t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in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it is applicable to use the census data rather than the statistical data to calcula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although th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calculated from the two types of data sources are both inaccurate.

Secondly, the provincial disparit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1982-2000 are explor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3rd, 4th and 5th census data in China. Four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ummarized: (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t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are of various types with great differences. Thus, an identical urbanization policy nationwide is inapplicable in China. (2)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was launched in the 1980s, the growth rate of urbanization level greatly exceeds that of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in most provinces of China, which results in a sharp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ovinces with urbanization lagged behind and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ovinces with industrialization lagged behind. (3) In those provinces with rather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and rapid growth rate, such as Shanghai, Zhejiang, Jiangsu, Fujian, Guangdong and Beijing, their urbanization levels are still lower tha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while in those provinces with rather lower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low growth rate, such as Heilongjiang, Liaoning, Jilin, Qinghai, Guizhou, Guangxi, Hubei, Chongqing, Hainan etc., their urbanization levels are, however, higher tha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4) The provincial disparit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primarily caused by various growth rat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mong provinces, in particular the sluggish growth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statistical data; census data;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regional disparity; China